

龔鵬程主編

古與詩歌研究叢刊

龔鵬
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四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5 冊

魏晉詠史詩研究

黃雅歆 著

俊逸鮑參軍

——南朝元嘉三大家之鮑照詩研究

陳敬介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詠史詩研究 黃雅歆著／俊逸鮑參軍——南朝元嘉三大家之鮑照詩研究 陳敬介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序 2+ 目 2+114 頁 + 目 2+142 頁；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四輯；第 5 冊）

ISBN 978-986-6657-35-1 (精裝)

1. (南北朝) 鮑照 2. 詠史詩 3. 詩評 4. 六朝文學

820.9103

97012115

ISBN - 978-986-6657-35-1



9 789866 657351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四輯 第五冊

ISBN : 978-986-6657-35-1

魏晉詠史詩研究

俊逸鮑參軍——南朝元嘉三大家之鮑照詩研究

作 者 黃雅歆 陳敬介

主 編 襟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姐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第四輯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魏晉詠史詩研究
黃雅欽 著



作者簡介

黃雅歆

台大中文系畢業、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碩士論文《魏晉詠史詩研究》。

輔大中文所博士，博士論文《清初山水詩研究》。

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所專任副教授。

提 要

詠史一題雖自東漢班固揭漸而起，實至魏晉時期才蓬勃發展。蓬勃之因與魏晉當代之政治、學術背景密切相關；其發展過程亦非僅因自班固詠史的開創，更承襲了先秦詩歌的傳統精神。詠史詩之發展脈絡有二：一是以班固〈詠史〉為典型，詠一人一事，述、贊分立的基本模式；二是承先秦詩歌「以史抒情」之傳統而來，基本形式為合多人多事於一主題下為詠，擇取史事片段情境而用。此二線各具典型而不相混，二者融合而樹立了詠史一體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

本論文以魏晉時期詠史詩為研究對象，一方面探討此一新興詩體的性質、範圍、誕生環境及淵源；另一方面針對魏晉詠史詩的發展脈絡及形式演變、精神風格分別析論，並論其影響與價值，以俾接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冀能在文學史的討論上提供一點助益。

論文大綱如下：一、緒論。二、魏晉詠史詩的誕生機緣。三、魏晉詠史詩之發展與型態。四、魏晉詠史詩的情志與風格。五、左思的詠史詩。六、魏晉詠史詩的評價與影響。七、結論。

自序

魏晉六朝在政治上是動亂頻繁的，而這混亂的時代卻正是我國純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尤其是在詩歌發展上，各種詩體的醞釀成形，藝術技巧的開創與進步，更居後代詩歌發展的奠基之功。在朝代更迭，表面平靜、內含不安的時代下，文人們内心多有深刻的身世之感，其心靈世界亦值得探索。於是，筆者自接觸中國古典文學以來，即對六朝時期文學極感興趣，至進一步研讀後，更覺內容豐富，值得鑽研。

本題之撰寫即在前述之基礎上，並起源於與陳鴻森先生討論時所獲之建議。之後筆者再次研讀六朝詩，並觀其後詩歌之發展，確知詠史一體為我國詩歌發展史上重要的旁支。其雖非詩壇之主流，然自魏晉蓬勃發展以來至清而未絕。詠史一體實有著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其獨有的風格與誕生背景亦與詩人所處之時代與學識密不可分，在中國詩歌中是極獨特的。魏晉時期為詠史一體之奠基期，亦樹立了此期詠史詩的特有風格，在文學史與作品本身的價值上皆深具意義。唯前人論此著作甚少；或有論詠史而未著眼其詩體萌芽至成熟的發展過程，或有論魏晉詠史而未成專著者。故筆者始擬以魏晉詠史詩為題，為此不容忽視的詩體廓清其源流與發展脈絡，以俾接續唐朝以後日成江河的詠史作品。

本題撰寫之初，得齊師益壽早年研究之啟發，並得林師文月資料的援助與鼓勵；撰寫其間，更獲葉師慶炳悉心的指導與幫助，使論文得以完成；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若有學力未逮之處，容或日後研究再予補充修訂。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黃雅歆謹識
於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引言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二、研究範圍與大要	3
第二節 詠史詩之界定與問題澄清	5
一、義界	5
二、詩史、懷古與詠史	9
三、詠史與詠懷	12
第二章 魏晉詠史詩的誕生機緣	15
第一節 政治、社會之劇變——傳統價值的動搖	15
第二節 史學之發達	21
第三節 文士之苦痛與詠史之獨特形式	25
第三章 魏晉詠史詩之發展與型態	31
第一節 魏晉以前之詠史作品	31
第二節 以班固〈詠史〉為典型——魏晉詠史詩(甲)	41
第三節 以史抒情寄意之傳統——魏晉詠史詩(乙)	48
第四章 魏晉詠史詩的情志與風格	55
第一節 主題精神	55
一、逸士、高士之典型	56
二、懷才不遇的志士	59
三、救急解難的壯士與豪士	60
第二節 藝術風格	64
第五章 左思的詠史詩	71
第一節 形式結構	71
第二節 文辭技巧	77
第三節 精神義蘊	81
第六章 魏晉詠史詩的評價與影響	89
第一節 詠史詩與魏晉詠史詩之評價	89
第二節 左思的影響	96
第三節 南朝詠史詩小論	100
第七章 結論	107
參考書目	11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引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詩歌進入六朝，是個萬苗滋長的時期。詩歌逐漸脫離了民歌色彩，成為具有個人風格的文人作品。在這段時期，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皆得到極大發展，各種題材的開拓，句式長短的試驗變化、形式技巧與音韻的講求等等，甚至於文士寫作的各種不同心態與立場，在這三四百年間（註1），都已清楚的顯現出來。

玄言詩、遊仙詩、擬古詩、山水詩、田園詩，以及詠物、宮體詩等，皆是在六朝時期所蘊育出的、具有獨特內容指稱的各類詩體。而詠史詩亦與前舉數類詩一般，在詩歌發展上，是具有獨特意義的一個詩類。

詠史詩之名雖由班固所揭墾——班固詠史詩以緹縛救父一事為

〔註1〕自曹丕建魏（西元220）至南朝陳國滅亡（西元589）止，共三百六十九年。歷史上所稱六朝，是指建都於建業之吳、東晉、宋、齊、梁、陳等六國。然而，文學史上的劃分却不能應歷史標準來區分；事實上，魏晉以至南朝四國，在文學發展上有著密不可分，一脈相承的關係，此可謂文學史上所稱「六朝」之意涵。

詠。而事實上，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詠為嘆的詩作，要在魏晉時期才大量產生。魏晉文士所作「詠史詩」，大抵不脫班固詠史詩作的形式，以囊括史事為全詩主體，詠嘆部分僅僅點到為止；直至左思詠史詩的出現，才使詠史詩跨入新的境界，確立了「詠史」一體在文學史上的價值。詠史詩可說是出於魏晉成於魏晉的一個詩體，而更重要的是，「詠史」一體自確立之後，從唐宋至明清始終行而未墜，迭有開拓。唐代懷古、覽古詩的出現，可視為詠史詩之同一脈絡；宋詩重議論，詠史詩便展現了哲理色彩；甚至在古典詩詞衰退的元明二代，詠史詩仍大量的產生，詠史詩在文學史上從來不是主流，但卻一直持續著、發展著，顯示著某種存在的「需要」，這種「需要」顯示著文人與時代，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因此探討詠史詩產生的原因及發展過程，便有文學史上的意義。

前段所述詠史詩，是以班固詠史為立足點，以〈詠史〉詩一題出現為始，往下討論以詠史為題之詩作；然而，若要全面探討詠史詩的發展，則必須拋棄詩名的侷限。雖然以詠史為題的詠史詩是自班固揭示，至魏晉時期大量出現，但事實上，魏晉許多非題為詠史的詩作內容，與歷史事件亦緊密相關，同樣是詩中詠嘆的主題，這些詩作之類型却不似承自班固而來。再仔細往上推敲，其實以歷史人物、事件為詠嘆的創作手法，是極早便存在的了。可追溯至《詩經》以及《楚辭》中的某些篇章（註2）。借古人前事而言己意，是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裡的常見筆法，以史抒情的方式可視為後來詠史詩的先驅，它早在班固詠史詩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但是，這並不表示班固詠史詩的出現僅僅只是提供了一個「詠史詩」的名字而已。事實上，班固的〈詠史〉樹立了一種特有的形式，僅管鍾嶸批評它「質木無文」（註3），魏晉

[註 2] 在《詩經》的雅、頌部分，如〈文王有聲〉、〈公劉〉、〈文王〉、〈生民〉等篇，皆言及商周祖先及歷史傳說，歌頌詠嘆。屈原的〈離騷〉、〈天問〉中，則引用了歷史人物、事件傳說，借古諷今，借史抒懷。

詠史並未成為作品的主體與創作目的，但可視為詠史詩發展之先驅。

[註 3] 鍾嶸《詩品·序》：「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

時期出現以詠史為題的詩作大多無法脫離班固的形式，彷彿「詠史詩」已有一個典型，這個典型以班固的詠史詩為依歸。

而以史抒懷的傳統仍然持續著，與班固詠史詩並存，在魏晉時期也有了更大的發展，它發展的空間與自班固詠史詩出現之後，以詠史為題的詩作，似乎是兩條脈絡；而這「有實無名」的詠史詩，實際上却有著淵源深遠的文學傳統。兩條脈絡在魏晉時期結合，使得詠史詩邁向一個新的境界，左思的詠史詩便是其中最大的功臣，他確立了詠史一體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

詠史詩的發展與確立，魏晉時期是一個關鍵的時代，它為何在魏晉時期如此的蓬勃，亦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再者，「詠史始自班固」的觀念可有再加補充與說明之處；而詠史的出現，往往便是文人對時代的關切或自身立場的告白，令人動容。因此，筆者選擇魏晉詠史詩為題詳加考察，冀能在中國詩歌史的討論上提供一點助益。

二、研究範圍與大要

詠史詩的大量出現是始自魏晉時期，其發展、變化與成型，直至左思詠史締造的高峯，也在魏晉時期。本論文所欲探討的範圍即在這詠史詩奠基的階段，時代以魏晉時期為主，考察當時詩作的內容及背景，進一步分析詠史詩產生的因素以及發展的過程、特色；往上兼論其源流，往下論其影響，以俾與唐代詠史、懷古詩接續。

詩作取材以逯欽立所編校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註4）為主，並輔以其他相關資料。研究方式則先以縱觀詠史詩之脈絡，逐一分析其演變情形與形式特質；再以橫論魏晉詠史詩的內涵，綜合討論。本論文之研究大要如下：

「詠史」二字看似明白易曉，其實何詩可稱之為「詠史詩」却有待說明。蓋「史」字易明，「詠」字則可生多重認定，前人亦多有討

[註4] 此書蒐校較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為詳，而偶有見於丁書未見於逯書之詩，故互為參用。

論。本論文第一章緒論之第二節即作問題的釐清。分析前人的說法與觀點，試提出合理的解釋，以適於進行本題的討論。近代學者對詠史詩的發展與特質亦有不少研究成果，本節亦將做概略性的介紹，同時亦提出本論文之分類標準，說明筆者的著眼點和理由。

第二章分析魏晉詠史詩的誕生機緣。任何一種詩體的產生、盛行，皆與時代背景相關，詠史詩亦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詠史詩雖流行於魏晉時期，却未成爲文學主流；它特殊的性格，和文士創作之間的關係，透過時代背景的分析，可清楚的呈現出來。本章擬分爲三節，從政治、社會的變遷、史學的發展，以及文士內心的苦痛，與詠史詩本身應運而生的獨特性質，建構魏晉詠史詩的誕生環境。

第三章進入魏晉詠史詩的本題。如前文所述，筆者認爲魏晉詠史詩可分兩條線索來考察。其一自是以班固詠史詩爲首；班固開詠史一名，詠史詩也有了一個簡單的模式——史事十贊語（註5），這其實也正是史傳的撰寫方式，將在後文詳加討論。這種模式在魏晉詠史詩中持續著，一直到左思詠史詩才有轉變。而其實左思詠史的別開新境是有跡可循的，這就必須論及「以史抒懷」的文學傳統；這條脈絡存於中國文學的血源裡，它並不在「詠史」的名下發展著。而詠史詩是不是該以班固的作品爲「正」，不同於班固的則爲「變」（註6）——因爲詠史之名畢竟是由班固而起的，這亦爲爭論焦點。了解詠史詩的兩條線索有助於釐清詠史詩的糾葛，筆者嘗試給它一個架構，一一分析其形式、精神。爲了使架構更爲突顯，並不做細微的分類；先分論這二條脈絡各自的發展過程及特色，繼論二者之間的關係。至於脈絡如何劃分界定，詩作取捨的理由，亦將討論於本章之中。而魏晉之前詠史

(註 5) 班固詠史詩以五言作。全詩十六句，僅後二句發爲喟嘆，前十四句完全依緹蒙史事濃縮成詩，交待其事之來龍去脈。

(註 6) 何焯《義門讀書記》文選卷二：「詠史不過美其事而詠嘆之。槩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自據胸臆，乃又其變。」何焯善立「正」、「變」之言，亦論遊仙詩：「何敬祖遊仙詩，遊仙正體，宏農其變。」

詩發展狀況亦於本章第一節中陳述。

第四章探討魏晉詠史的情志與風格。魏晉詠史詩有其誕生的獨特背景，也有其不同於文學主流的獨特詩風，但亦無法脫離當代主流文學之影響。而此期詠史詩之風格以詠史抒懷為重點，作者個人的情志精神左右著詠史的內涵，是魏晉詠史詩重要價值之所在。本章即以詠史詩體著眼，進行主題分析與性質討論。

魏晉詠史的二條脈絡是論其發展的過程，而二者之合流實為「詠史」一體在魏晉時期之重要階段，左思無疑是其時之重要詩人，由於地位特殊，本論文將於第五章專章討論左思的詠史詩。因左思個人精神的展現，以及詠史詩體發展的逐漸成熟，使詠史詩不論在形式、義蘊乃至創作技巧各方面，都得到極大的開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六章為魏晉詠史詩之評價與影響。詠史詩在魏晉時期奠基，後代迭有發展，隨著各代詩風的轉變而多樣化。歷代詩話、詩論中存有不少關於「詠史」一體的評論；本章第一節即歸納前人評論觀點，討論詠史詩的評價，並對詩體之「正」、「變」觀念再探討。第二節以左思為主，論魏晉詠史詩的影響，第三節則小論六朝詠史詩的發展情形。

第七章結論，做為本題研究之總結。後附參考書目。

第二節 詠史詩之界定與問題澄清

一、義界

詠史二字乍看之下很容易明白，然而進一步探索，僅是「史」的範圍，就十分廣泛；而如何「詠」，才叫詠史，也是個不易劃分的問題。「史」之所指為歷史殆無爭議，如前節所述，詠史是以詠歷史人物或事件為主的。而詠史的對象，除了正史的人事外，尚應包括了野史與傳說。

詩人們詠史，雖有些僅止於歷史的複誦，而大部分或多或少都脫離不了「以前人酒杯澆心中塊壘」的色彩。或藉此提出自己的追求典

型，或表達無法明言的心情與意見，或以前人為自己的代言體；因此，選擇詠嘆的對象，多半是要形象鮮明，亦要普遍易曉，至少是為當時人所知的。那麼野史中的王昭君故事（註7）、傳說中的仙人王子喬，以及神話故事的刑天與精衛等，都可成為詠史的對象。

中國史學的發展到魏晉時期有了重大的轉變，關於「歷史」，魏晉人士有不同的看法。

時代的動亂，使傳統的價值與舊有的秩序都將面臨考驗，為了尋求未來的方向，此時的知識份子通常有著強烈的時代感，激使他們對歷史的探索，造成史學發展的高潮。魏晉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在文學與史學發展上皆是關鍵時刻。

關於魏晉史學的變革此不贅述，值得得注意的是，在魏晉史學作品的眾多形式裡，「最足以表現魏晉史學特色的是雜傳」（註8），而「在魏晉雜傳中，最能突出這個時代史學特色的就是志異傳記，這一部分志異作品在唐宋以後劃入小說。但在魏晉時代却被視為真實的存在而進入史學的範圍」（註9）。這自然是與儒家的衰退、玄學興起有密切關係，但也正可由此看出魏晉時人對「史」的認定，異於一般。

因此，詠史之「史」不必拘泥於正史所載。

雖然以詠史為題，是起自班固的詠史詩，魏晉時期亦大量產生以詠史為題的詩篇，但僅依詩題來分辨詠史詩却是不可行的。當然，題為詠史者即為詠史詩是不容置疑的；但若二詩除了題目有異之外，於形式、主題及構想上皆具共同特質，則無須也無法去強制區分。就簡單以「詠史」本質為「詠嘆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觀點來考察，所謂「詠

[註 7] 王昭君事蹟原見於正史，《漢書·匈奴傳》、《後漢書·南匈奴傳》中皆有記載。但至《西京雜記》中乃有誅畫工之說，以及毛延壽的出現。後則再經文人筆墨、小說彈唱家之敷衍渲染，加入動人情節，遂成廣泛流傳之昭君故事，已非正史原貌。

[註 8] 邵耀東先生所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一文，《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八卷六期。

[註 9] 同註 8。

史」之作，便不僅存於以詠史為題的作品中，而且數量上可能更多。最重要的是，這些「詠史詩」，彼此間互相交流、影響，事實上是不可分的。

而何者為「詠」史呢？

歷來對詠史的定義多有討論，大陸學者降大任先生認為「詠史詩是中國古代詩歌中作者直接歌詠歷史題材，以寄寓思想感情，表達議論見解的一個類別」（註 10）（句中圈號為筆者所加）。提出詠史詩的三個要件：直接歌詠、寄寓情思、表達意見。而蔡英俊先生亦下定義為：「詠史詩是藉著歷史事件或人物做為詩歌作品的敘述對象（也就是詩的題材），而表達作者個人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觀感。」（註 11）以此與降大任先生所言相較，蔡先生所指詠史之詠，似乎較侷限於所敘述的歷史事件內，針對所詠史事表達觀感，有沒有藉古喻今是不得而知的。但觀其後所收詩作中，則可見其意與降大任所言「寄寓思想情感，表達議論見解」相去不遠，這些定義大致說來是不誤的，但是還有些問題必須加以說明。

所謂「詠」史，史事與詩的關係應是密切的，它不一定要被明白的直敘，所代表的意義可以被引申，或被重新詮釋；表現方式可富新意。作者可引史書評述為己意，亦可提出翻案之語，或藉古論今，這即是「詠」，同時也是使詠史詩更具意義的重要部分。如南朝詩人庾信一首〈王昭君〉，雖以王昭君為全詩主角，但是其重點在於王昭君出塞時之神情、姿態、服裝，無關史事，亦無感嘆；主要是以眼前婦女之美態幻想歷史美女之丰采，詠史的味道就很淡了，反而更近於當時流行的宮體詩。

[註 10] 見降大任先生所著〈試論我國古代詠史詩〉一文（《詠史詩註析》附錄，山西人民出版社）。所謂「直接歌詠歷史題材」之「直接」二字實有待說明。觀其文中所指，直接歌詠，即為正面敘詠歷史題材之意。直接與間接有關手法之運用，與正面歌詠史事之所指有別，須加以區分。

[註 11] 見《興亡千古事》一書前言。

再者，詠史與用典之間的區分亦需澄清，特別是在左思詠史詩中，有些史事似乎僅在詩中驚鴻一瞥（註 12），與所謂「直接歌詠歷史題材」，或歷史事件應是詩中主體的詠史詩本質似有相悖。關於此點，降大任先生有簡要的區辨：

古典詩歌創作中的「用典」，與詠史詩也需分清。古詩用典，大多關涉古人古事，有的詩幾乎通篇用典，但並非詠史詩。因為「用典」是創作手法問題。詠史詩却是指古詩的一種類別，與是否用典，是性質不同的兩碼事。（註 13）（文中圈號為筆者所加）

他更引金代元好問二首詩來加以說明（註 14）。

實際進行詠史詩的擇取時，這樣的觀念有很大的幫助，譬如李陵錄別詩中一首：「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首二句雖以鍾儀與仲尼離鄉望歸之情為引，然其詩主題並非在詠二人之事，並非以其精神事跡為主題，乃在以引起自身之感嘆，鍾儀與仲尼只是作為「遊子戀故廬」主題的歷史典故，詩之發端而已。所謂「戎馬悲邊鳴」，扣合的是李陵的處境，與鍾儀和孔子無關。

至如左思詠史，其題為詠史，實已明白揭示其詩主題是詠史，他在詠史之題的規範下作自由的創作，無論如何皆不可否定其為詠史之

(註 12) 如左思詠史第八，僅出現「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言及史事。

(註 13) 同註 10。

(註 14) 降大任先生言（同註 10 一文）：「比如金代元好問的兩首詩，一首是〈讀靖康之變〉，詠北宋末年『靖康之變』，以北宋滅亡的史事寄託對金亡的悲憤與感慨，屬詠史範疇；另一首（出都（二首之一））：『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見觚棱上金爵，豈知荊棘臥銅駝？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行過盧溝重回首，風城平日五雲多！』是詩中運用大量典故，影射詩人亡國前夕的真實情事，不是詠史。」

事實。著名的詠史八首以聯章的組詩型態出現，討論之時亦不能忽略聯章之作的特質。八首聯觀，前有序詩後似結語，其中則嘗試多種詠史詩創作的表現方式，以合為一組。分章視之，仍具有其獨立的價值，而其中雖有些詩中史事僅短暫明示，其全詩旨意仍依史事而生。換言之，左思詠史是將史事之述與己身之嘆合而為一，即直指史事，亦言己情，這與用典手法中典故是脫離原來史事血肉的工具有所差異。而要加說明者，即事實上，每一種詩類的建立，皆難斷然區隔，重要的是典型的確立，餘再就精神與形式以原則性的歸納。創作手法是另一層次的問題。

然而詠史之名，却易與懷古、覽古、詠古或詩史等題產生語意上的糾葛，雖然在魏晉時期困擾較少（註15），却是討論詠史詩時應該注意的。

二、詩史、懷古與詠史

史與詩在名稱上的結合，除了詩史、詠史詩之外，尚有史詩一名。這三者却不能混為一談。

稍涉西方文學者皆知，史詩為西方文學源頭之一，其不論結構組織、形式內容，以及精神氣勢，都與中國傳統詩歌面目大不相同。「史詩」一詞，已成專有名詞，指稱西方文學裡的 Epic，自與本文所論之詠史詩無關。

至於「詩史」一詞雖源自中國文學，但是它却不是詩類的名稱。降大任先生認為：

詩史，是對某些古典詩歌的特定稱呼，不是詩歌文學分類概念。詩史的「史」是對後人而言的，對作者來說，只是他生活的當代耳聞目睹的現實社會生活。詠史詩的「史」，不僅對後人，對作者來說，也已是前代歷史。二者形式可

〔註15〕雖然在魏晉時期未必無懷古詩的出現，但懷古之題標舉却始於唐代陳子昂，因此，在魏晉時期尚無懷古、詠史之名的混淆；而詩史之名殆行於稱杜甫詩，於魏晉時亦無所涉。

以相同，內容所反映的時代性不同。如杜甫的「三吏」、「三別」等作品，吳偉業的〈圓圓曲〉等，可稱詩史，却不是詠史詩〔註16〕

唐孟棨《本事詩》中有詩史的記載：「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高逸第三）〔註17〕詩史之所指殆起因於指稱杜甫之長篇律詩而流行，宋人論詩亦多提及。

詩與史的結合，可分兩方面來談。其一爲以詩記錄當代歷史，其二爲以詩追述詠嘆前代的歷史。前者多半是出自作者親歷的感受，通常是在一朝之混亂變動中，作者對時代對國家有深痛的心情，以文字爲時代的見證。由於是作者親睹的現狀，不僅寫來具動人力量，更能補正史之不足。這類作品所記內容，雖於今日我們眼中是屬於「歷史」，事實上，對當時人而言却是正在發生、或者剛剛發生過的事，他們參與了那個時代，並非來自冷冷的文字記載。所謂「詩史」之背景應屬此類，它不是詩類，沒有特定的形式內容，而精神背景却是相通的。「詩史」之敘事特徵較強，近於敘事詩類，但其中寓有作者之史筆。因其內容皆爲當代有定論之事物，作者記錄的觀點與評斷，無形即爲其史才史筆之顯現。因此，有人說詩史「雖然含有甚多作者的價值判斷在，既非主觀地抒情、亦非客觀地載事，而是透過作者的文化意識與歷史感情，展現歷史與時代的意義，提示歷史的評判。」〔註18〕

以作品追述詠嘆前代的歷史，則與「詩史」大不相同。詠史之

〔註16〕 同註10。

〔註17〕 依龔鵬程先生在〈史詩與詩史〉一文（《中外文學》十二卷二期）中附註一所述：「詩史連稱，最早見於宋書謝靈運傳：『先士茂製，諷高歷賞……。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及南齊書王融傳：『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但其意義似與唐宋以後不同。詩史爲唐人稱呼杜甫語，又見李朴與楊宣德書，但唐人文獻並無證據。」而後所稱詩史，蓋皆因稱杜甫詩之意而來。

〔註18〕 見龔鵬程〈史詩與詩史〉一文（《中外文學》十二卷二期）。